

市场、文化、改革

Market, Culture, Reform

郑也夫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一. 市场的积极功能

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而一个社会的富足是其知识、文化、科学蓬勃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如经济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施蒂格勒(G. J. Stigler)所说:“因为知识分子绝非廉价,所以在近代的企业系统兴起之前,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供养很多知识分子。据粗略估计,在伯里克利辉煌时代的雅典,职业知识分子(full-time intellectual)约200人,大约每1500人口中有一位知识分子。在以后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知识分子在人口中的比例锐减。今天的美国,至少有100万知识分子(只计算以笔和口谋生的那部分),每200人口中有一位。每五位知识分子中至少有四位是仰仗着市场的伟大成果而享有愉快生活的。”

市场为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更丰富的工作选择。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的社会中,政府极易成为知识分子产品的单一购买者。这种垄断性的扶持与购买,强化了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单向依赖,断绝了他们与大众及其需求间的联系。单一购买导致了知识分子供求关系上的双向失衡:一方面社会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需求量大于供给;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是唯一买主,它的消化能力有限,因此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严重过剩,大学毕业生难于分配。政府的单一购买还导致了知识分子自身素质的恶化:知识结构“御用化”,社会角色官吏化,个人性格工具化。(本节观点引自高佩文:《单一政府购买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

但是,以上的论述也有很大的局限。第一,虽然在发达的市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数量空前增长,但不能认为,市场本身会为一切类型的知识分子提供生存的机会。第二,即使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接受上述提出的三段论:“市场机制促进社会繁荣,社会繁

荣促进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发展”,也须指出,这只是一种间接的可能性关系。市场不会直接帮助某些类型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是市场所造就的繁荣富足社会中的其他一些健康因素(甚至与市场逻辑相对立的价值观),使得更多类型的知识分子保有一个较好的生存空间。如确这样,就必须承认,尽管市场有其巨大的积极功能,一个健全社会赖以存在的不仅是市场所代表的价值观,单靠它是不行的。第三,尽管市场社会比之政府垄断所造就的“兵营式”社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但市场也和政治一样,顽强地膨胀其自身的价值准则,从而限制着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为其施加单向引导。

二. 市场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对立

市场的本质是什么?市场的本质就是大众胃口。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市场的逻辑就是顺从和服务于大众胃口,寻找畅销商品。市场唯大众胃口之马首是瞻,将之称为上帝。市场认定最畅销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市场的铁律不能接受一个无销路的好东西,不管它是阳春白雪的艺术品,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人会说,不是有一些富商巨贾资助科学文化事业吗?我们说,这种善举恰恰不是市场逻辑,而是市场之外的价值观所使然的。马克思说,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的逻辑就是无休止地自我繁殖。资助文化的商人,没有忠实于商业,不是典型的商人,对纯商业而言他不是好商人。如果我们把科学文化的发展寄托在商人资助的愿望上,则客观上宣扬的恰恰是商业之外的、甚至是某种反市场的价值观,希望这种观念深入到商人脑子中,使其不完全忠实于商业,而盼顾科学文化。再者,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个人身上总是幼稚的,尽管总有“好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商人。就市场逻辑而言,它是不认科学艺术之优劣,而只认畅销与否的。

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可以进入市场,有些无法进入?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太宽泛了,它所涵盖的这一群体中的成员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殊为不同。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果着重考虑在市场面前的差别的话,可以将之划分为两大类:创造知识的人(科学家、先锋派艺术家)与某些传播知识的人(教师);应用知识的人(工程师、临床医生)与另一类传播知识的人(通俗作家)。不妨将第一类型戏称为“水”,第二类型称为“鱼”。第二类型靠第一类型知识分子去养育,因而没有“水”就没有“鱼”。但是能够走入市场的却只是“鱼”,而不是“水”。第一类知识分子在科学与文化上的价值是巨大的,但他们不拥有众多的顾客,或处在与市场完全不同的系统内(如普教)。第二类知识分子不处在文化领域的核心地带,而处在文化与社会、大众、市场的接壤地带,他们体现的纯科学、纯文化的价值虽不大,却拥有众多的买主。

为什么第一类知识分子,即我们戏称为“水”的不能进入市场,这是科学、文化与义务教育本质所决定的。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探索大自然奥秘的事业。用乔治·萨顿的话说,它是不问利益与用途的。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以至陈景润,是我们星球最智慧的一些人。但你询问他们:“诸位的成果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造福于人类?”他们无以解答。这是因为科学发现能否走入应用不是都可预测的;即使走入了应用,发现与应用之间也往往有着巨大的时间跨度,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若只为造福人类,爱因斯坦即使选择一千个课题也不会选定相对论研究。换言之,要科学迅速变为生产力,就是在剪裁它无拘无束自由探索的触角。宏观而言,科学研究丰富了人类的知识积累,从而最终提高了我们驾驭外物的能力。但微观而言,科学家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世间最实际的是种田,做工,经商,最不实际的是科学研究。但前者蔽于实际,不会有重大的发现;后者超越实用,才会将我们引入新境。只讲科学要实用,就是不要科学。能走入市场的是依赖于科学的技术,而不是那些基础贡献。

什么是文化?不错,因为文化人类学家的贡献,文化早已不囿于“文、史、哲”的狭小天地中,而统摄了人类后天获得的某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至某种时尚、风格。甚而还有了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等等“文化”概念的泛滥。但也正是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文化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文化是人类超越动物性的依据和成果。每个民族最古老的文化传统都离不开神话与宗教。人类为什么要创造出它们?因为在衣食之外,他们还需要对外界作出某种解释,为生存找到某种意义。为什么每个民族都不忽视自己的历史与考古,就是因为即使

他们当下的生活蛮不错了,他们仍想超越此刻。历史、考古与理想、乌托邦共同体现出了人类对从远古到未来的“超越此刻”这一欲望的博大关怀。不错,很多文化产物进入了市场,但也永远有很多文化成果及其承担者进入不了市场。而如果不愿退回到饮食、性欲的动物性生存中,人类就要拥有自己民族的历史、道德、宗教、理想和历史学家、诗人、哲学家,而不以市场的逻辑来裁定他们的存亡。

什么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另一个名称是强迫教育。它强迫每一个少年儿童接受一定时间的正规教育,以完成“人的社会化”。义务教育与市场的逻辑截然不同。市场是自愿的,是一支无形的供求关系之手操纵其运行的。义务教育则是强迫的,是有形的手——政府管理人员去运作它的。市场是功利的。义务教育则既有社会功利的一面,掌握起码的知识利于一个人在社会谋生;又有非功利的一面,有些人认为不学文化也能发财,虽然可能如此,但社会不允许他这样。人不是一出生就成其为一个人的,他是在“社会化”(接受一定的规范、习俗、道德、知识)后才能在社会上生存的。极而言之,义务教育就是不允许我们的社会中不断进入一些“猴子”。那将打乱文明社会的秩序,将使人与人的交流受阻。正是因为社会上有识之士认为这种价值是基本的,因而他们推动了政府,拒绝让教育按市场的逻辑——自愿买卖去运行。有人会说,西方社会中的私立中小学校不是也照市场规律运行吗?但他们忘了,这些学校从来不是主流。多数中小学从来是国家承办的,它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因为科学、文化与义务教育的这种属性,它们的主要活动及成果是进入不了市场的。有时候,这些基础知识中的某些部分可以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因为它可以被亿万人无偿地使用(比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又比如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正如默顿(R. Merton)概括科学的特征时所说(我们以为这也是基础文化的属性):其第一特征便是“公有性”(Communalism),因为基础的科学与文化进不了市场,是无偿为社会服务的,是人类共有的知识,它也只好靠社会去资助它。从孟尝君到类第奇,文人、智者、艺术家、科学家,从来是靠帝王与贵族资助的。近现代历史的进步在于使这些智者不必再依附于某人,可以依赖于非人格化的制度——政府或免税杠杆促成的基金会,从而获得了人格独立的尊严。

三. 健全的社会结构中的三大系统

任何一个近现代社会都不会是单一结构的。简言之,它拥有三大系统:政治、市场、文化(包括科学与教育)。在现实中,这三大系统未必鼎足而立,可

能有此消彼长之情形。比如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政治系统高度膨胀,在政治系统操纵和计划经济的形势下,市场极度萎缩,在政治系统的压力下文化系统成为一个御用部门。但即使在这样的极端状况中,也不能说它完全失去了市场系统(资源计划之下部门间的私自交换从未减少)和文化系统。但毕竟,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三大系统的独立存在,因而改革开放后十年中的趋势是市场与文化都在摆脱政治的束缚,追求自身的发育。

三大系统间总是存在着密切的交流的。这交流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每个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服务或参与到其他系统中。比如文化系统帮助政治系统提供一种社会凝聚力,一种意识形态;文化系统中的一些产品(上述的“鱼”类知识分子的产品)进入了市场。其二是人员的转行。文人可以变为商人,也可以变为官僚。但如果交流有着积极的社会功能的话,交流的前提却恰恰是一个个独立系统的存在。如果文化系统被政治或市场吞食了,那么剩下的便只是后者的单项自我繁殖了。三大系统各自独立存在的根据与标志在于各自独立的价值观的存在。政治系统的追求是权力秩序,市场系统的追求是财富增殖,文化系统的追求是认知的发展与美的发现。美国奥斯卡电影大奖的正式名称是Academic Award(学院奖)。从这一名称中便可见到美国电影艺术家们的立场:尽管电影是要走入市场的文化产品,他们却并不准备使自己的标准屈从于市场的票房,这大奖永远是由学院派中的少数权威人士来评定的。通俗文化尚且如此,更何况科学。在科学的殿堂里,即使一项成果赢得了亿万美元也未必登堂入室。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科学与文化的王国有其自身的价值与标准。说政治与市场的标准也是文化的标准,说实用是科学的标准,就是否定文化与科学的存在。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当文化系统中的每个人都屈从于政治与市场的价值之时,就是文化系统覆灭之日。

中国的文化系统同市场一样,长期隶属于政治系统。随着改革开放,文化系统与市场系统开始摆脱政治的束缚。在这一“解放”的过程中,文化与市场曾相互辅助。文人曾鼓吹市场经济,为之鸣锣呐喊。市场瓦解着官本位的一统天下,帮助文人获得新的生存空间。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统一战线”转瞬即逝。市场带着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贪婪的本性,开始了其自我膨胀。它要将它的标准打进一切领域。它要将一切产品变为商品,畅销者存,滞销者亡。且因历史的“玩笑”,政治与市场在今日又恰好联手,使文化处在左右夹击,进退维谷的围剿之中。

虽说一个系统能否存在取决于该系统核心地带的人物能否坚持其信念,坚守其阵地,但在日趋

世俗化的今日社会中,将一个系统的存亡建立在他是否拥有一批殉道者之上是不现实的。如果在从政、经商、搞科学这一三叉口上的选择还存在的话,至少就不能使一个搞科学的人的生活水准落后于该社会绝大多数人。

三大系统并存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但在促成这一和谐的局面中,三系统发挥的作用却是不等的。有了政治系统的开明,才有了市场系统的发育。同样,有了政府管理者的远见,才会有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保障。现代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既是工农商的分工,又是务实(如工农商,满足人们眼前需求)与务虚(如科学,为人类长远的发展提供知识准备)的分工。将不能进入市场的文化活动强行逼入市场——要科学转入实用,要学校兼办企业,要一切知识人去自救,是管理者推卸责任的廉价借口,是对现代文明赖以建立的分工制的反动,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毁。

四. 知识部门的现状

滥竽充数。从本世纪初叶中国开办高等教育至1982年,《教育年鉴》记载共有大学毕业生352万人。减去移居台港海外及死亡者,估计至1982年大陆人口中有大学毕业学历的有300万人。但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大学毕业学历人口数竟达440万人(还未算普查中的大学肄业生数)。可见,至少有140万人是虚报的。即使自学成才也应报在大学肄业人口中。仅在硬指标“大学毕业”人口中就在三分之一是滥竽充数。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中滥竽充数者则更不在少数。

人浮于事。据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年鉴统计,世界各国高校中师生比例如下:韩国1:37,美国1:32,苏联1:14,日本1:10。中国这些年始终是1:5左右。大学大约不是唯一人浮于事的知识部门。

良莠不分与大锅饭。中国职称基本上评定只按资历。据1990年教育年鉴统计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仅占正副教授的3%。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缺乏人才,是人才淹没在大量的庸才之中。

制造垃圾。设置与教学分离的科学院与社会科学院系统是十分荒谬的。以社会科学院系统为例,如果科研与教学合一,即使一个人科研上暂时无成果,他至少做了实实在在的教学工作。而如果他专职科研,在社会科学院即专门写书,就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压力,他写不出书就是没做工作。写作本来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不是什么时候都写得出的。社科院系统逼迫每个人写出东西去评职称,去完成任务,遂使大批文字垃圾得以产生。这些劣质的东西不但没有好作用,反而有坏

作用。如果少一些垃圾,我们至少易于发现好作品。垃圾埋没了少数优秀作品,使社会难于发现。它造成的是物质、人才、时间、以至几代人生命的多重浪费。

脑体收入倒挂是多年来知识分子常常议论的话题。但近年来在生存的压力下,相当数量的知识部门、知识分子兼营他业。现在在正规的社会统计中,我们已经很难算出一个人在正业、副业中的全部收入,很难说一个教师的收入一定比一个工人少。但我们有把握说,一个教师、一个研究人员从正业——教书与科研中获得的报偿是低于体力劳动的。他通过兼业,部分地退出知识职业,去获取收入。

五. 知识部门的改革

把文化系统中从事应用性、技术性、通俗性工作的知识分子推向市场,他们的角色可以与市场吻合,他们可以在市场中找到自己价值,发掘自己的潜力。

科学与教育上的支出,必须由政府承担,不可以将之推向市场。学校办企业应该明令禁止。学校兼营公司若能与真正企业匹敌,不是对企业的嘲讽吗?兼营他业的学校能办好教学,不是对一心专搞教育的学校的嘲讽吗?让企业与学校各自办好自己事情,政府来调节它们的关系。

政府应该为学校提供充分的设备经费,为教师提供中等偏上的社会收入。这是代表全社会行使权力,资金不够尽可以收税,教育乃民族百年大计,没有解释不通的难题。

不可以把科学、教育推向市场,不可以使科学家、教师处于贫困线,从而人格受辱。唯一的选择是减少科研与教育领域中的滥竽充数、人浮于事。一句话,这些领域需要裁员,政府只能供养一定数量的科学家,愿意参加竞争的都可参加,失败的则另

择他业。

科学界的裁员也就是修起“门坎”,不养滥竽充数者。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并且只能由学者、专家自己完成,外行不能代劳,科学有它自己的标准。

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系统应逐步地与大学合并,这样在设备、资料、人才上都免除了浪费,且铲除了制造垃圾的机制。

合并后的大学是中国科研与高等教育的大本营。修“门坎”与裁冗员应从这里着手。只要使“师生比”提高一倍,即一个教师教十个学生,即使教育资金不变,教师的收入也可达原薪水的3~4倍(因为被裁人员的住房、医疗、养老金同其工资一道节省下来)。作出这一选择,对于决策者来说是艰难的,因为社会的心理承受力往往比资金紧缺更使他们焦虑。但大学僧多粥少,大学教师的收入与社会声望都步入谷底现状都会缓解裁员与转业的艰难。

裁下人员的出路是经商,转到与商业可以挂钩的技术职业中,或去中学教书。被顶替的中学教师再转业或下放到小学。这样中小学教师的水准就大大地提高了。

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在古今中外从来都不是卑贱的。是我们的低收入与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得这一职业丧失了它的声望。因此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也需全面改善。

只要认清教育、科学、文化的独立价值,市场的到来引发的就不是危机,而是知识部门改革的契机。因为市场促进着经济的繁荣,并且必然疏导、疏散着知识部门人才的拥挤。

伟大华夏文明的传统就是知识立国。如果说我们也有过一个宗教的话,那就是“教育教”,它无疑是儒教的核心。二千年的历史,一百年的巨变没有摧毁它在民众潜意识中的深根。今天,教育、科学、文化正在孔子的故乡经历着新的严峻考验。

(责任编辑 蔡德诚)